

3月20日,被称为“长安街上最后一根烟囱”的国华北京热电厂燃煤机组全部关停。北京工业占GDP比重曾高达64%,烟囱也曾是北京城市符号。



新中国成立以来,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几经变迁。曾经,“强大的工业基地”是北京的“名片”,上世纪90年代,北京开始战略性产业调整;新世纪始,焦化厂停产、首钢熄炉……曾经承载“光荣与梦想”的老工业告别北京城。今年,随着京津冀规划纲要的出台,北京再度面临一次全新的城市格局重塑。

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此次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上讲话指出,京津冀协同发展“为北京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”,也将开辟区域优化开发的崭新局面。

“这将是一次重要的矫正,矫正的是北京多年以来积累的非首都功能。”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表示。

京津冀协同发展: 北京的“矫正手术”

冒烟的烟囱曾是北京“城市符号”

1958年,首钢“第一炉钢”炼出。同年,北京市委提出争取在5年内,把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基地的口号。

如同这座城市急于改变的“消费性城市”历史遗留面貌,自上世纪50年代,国家在城市定位时提出了“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”,为北京打下“老工业”的沉重基底。

“回顾历史,当时对首都战略功能定位缺乏清晰的认识,城市定位出现了偏离。”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、北京方智智库首席专家赵弘指出。

数据显示,历史上北京工业占GDP比重曾高达64%,仅次于辽宁,位居全国第二。1979年,北京工业产

值超过天津,仅次于上海,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,冒烟的烟囱也成为北京的城市符号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北京户籍人口已从新中国成立时的414万增至950万,城市的宜居性也大不如昔,污染、能耗和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,成为北京“工业基地”发展模式的代价。

80年代,国家开始试图扭转北京“偏离”的城市定位,国务院三度就北京“转型”批示。1982年修订的城市总体规划显示,北京的“工业基地”城市功能已被抹除。

“转型经历了很长时间,因为‘大工业’情结很难抛除。”赵弘介绍,直

到1997年党代会,贾庆林代表市委、市政府提出了“首都经济”概念,将首都经济的本质定义为知识经济、高新技术产业,北京由此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。

曾承载“光荣与梦想”的老工业,随新世纪的来临次第退出。焦化厂、化工二厂、东郊棉纺区、“北人”机器厂、首钢石景山厂区……北京历史上曾“大进”的工业,自90年代起借由迁徙、停产、转型等方式,度过“大退”的阵痛。

同时,中关村的发展,CBD、金融街的建设,服务业越发占据主导地位。1994年,北京三产比重首次超过二产,2006年,三产比重已超70%。

度还比较高,一些不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产业退出缓慢,区县同质化发展现象突出等。

“如果及早认识到城市发展的规律,可以做到提前谋划城市病的解决。”赵弘表示,从国际上来看,首都城市可以分为两类,一类是单一功能的首都,比如华盛顿、堪培拉;另一类是东京、巴黎、伦敦等复合功能的首都。

北京走了复合型首都的道路。从东京上世纪攻坚“城市病”的经验看,赵弘介绍,这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“药方”,包括搬迁工业企业、建设多个副中心、建设首都圈、疏解城市功能等,同时辅以地铁和市郊铁路的建设等。

北京积累了过多“一般性功能”

2014年2月底,习近平考察北京时提出“四个中心”,提出首都核心功能是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。同时,他要求京津冀要“抱团”发展、打破“一亩三分地”的思维定式。

“北京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多。”郭金龙表示,此次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》中,明确了23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,“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守住的底线。”

郭金龙还指出,北京“人多”的背后,是功能太多。必须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作为先导和突破口。

赵弘认为,作为首都,北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城市积累了过多的“一般性功能”,数量、规模、体量超出了首都城市的需要。“京津冀的协同发展,将是一个重要的矫正。矫正的是北京过多积累的非首都功能。”

为了完成疏解非首都功能的“减法”,郭金龙介绍,一年多以来,北京围绕落实城市战略定位,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,制定实施新增产

业禁止和限制目录,关停淘汰一批不符合功能定位的企业,推动搬迁一批物流基地和商品市场,引导创新资源向周边地区优化配置,着力推进人口调控和拆除违法建设等。

“疏解非首都功能不是要限制北京的发展,不是不发展,而是要使发展与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。”郭金龙强调,北京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几大优势,其中,科技智力资源是北京得天独厚的优势,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是另一大优势。

开放综合试点,做强“北京服务”的品牌。

赵弘表示,京津冀的协同发展过程中,应注重破解政策、交通、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瓶颈。例如,各地政府之间在跨区域合作中,怎么实现利益共享,包括GDP、税收政策等如何调整。

另外,如何破解公共服务的落差,例如户籍、高考制度、退休保障、医疗异地结算等,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将面临的一个课题。

北京城市功能定位

上世纪50年代——改革开放前夕

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

1982年,修订城市总体规划,不再提“工业基地”

1993年,国家政治、经

济、文化中心

2004年,国家首都、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宜居城市

2014年,习近平提出首都核心功能是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

(据新京报)

经济快速发展致人口过快增长

工业的迁徙与服务业的繁荣,重塑着北京的城市格局。据原北京市工业促进局统计,从1985年到2005年,北京中心城区工业企业搬迁286家,置换出工业用地12.07平方公里。

不过,国务院1993年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,依然保留了“经济中心”这一提法。直到2004年新版规划中,才一改以往数十年的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定位,代之以“国家首都、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宜居城市”。

有专家指出,受制于国家现行财税体制,北京依然难以摆脱扩张经济规模来增强财力,以维持城市运行和发展的模式。

经济快速发展引致首都人口过快增长。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此次市委全会上坦言,历次确定的1000万、1250万、1800万等人口控制目标屡屡被突破。
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指出,如果北京按照2004年版规划定位“不折不扣”地执行,就不会出现现在面临的环境、人口、房价等沉重压力。而实际上,北京被赋予了太多的经济、金融功能,造成了“摊大饼”,功能过多而形成了城市的紊乱。

此外,北京还存在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,例如科技、文化资源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,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,投资对房地产的依赖